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我生在北京西郊的大学区里，长大以后，到美国留学，想要恭维港台来的同学，就说：你国语讲得不坏！他们也很识趣，马上恭维回来：不能和你比呀！

北京乃是文化古都，历朝历代人文荟萃，语音也是所有中国话里最高尚的一种，海外华人佩服之至。

我曾在美国华文报纸上读到一篇华裔教授的大陆游记，说到他遭服务小姐数落的情形：只听得一串京片子，又急又快，字字清楚，就想起了大明湖上黑妞说书，不禁目瞪口呆，连人家说什么都没有去想——我们北京人的语音就有如此的魅力。当然，教授愣完了，开始想那些话，就臊得老脸通红。

过去，我们北京的某些小姐（尤其是售票员）在粗话的词汇量方面，确实不亚于门头沟的老矿工——这不要紧，语音还是我们高贵。但是，这已是昨日黄花。今天你打开收音机或者电视机，就会听到一串“嗯嗯啊啊”的港台腔调。港台人把国语讲成这样也会害臊，大陆的广播员却不知道害臊。

有一句鬼话，叫作“那么呢”，那么来那么去，显得很低智，但人人都说。我不知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但觉得该算

到港台的账上。再发展下去，就要学台湾小朋友，说出“好可爱好高兴噢”这样的鬼话。台湾人造的新词新话和他们的口音有关，国语口音纯正的人学起来很难听。除了广播员，说话港台化最为厉害的，当数一些女歌星。李敖先生骂老 K（国民党），说他们“手淫台湾，意淫大陆”，这个比方虽过粗俗，但很有表现力。我们的一些时髦儿小姐糟蹋自己的语音，肯定是在意淫港币和新台币——这两个地方除了货币，再没什么格外让人动心的东西。港台人说国语，经常一顿一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他们在想这话汉语该怎么说啊！他们英语讲得太多，常把中国话忘了，所以是可以原谅的。我的亲侄子在美国上小学，回来讲汉语就犯这毛病。犯了我就打他的屁股，打一下就好。

中国的歌星又不讲英文，再犯这种毛病，显得活像是大傻子。电台请歌星做节目，播音室里该预备几个乒乓球拍子。乒乓球拍子不管用，就用擀面杖。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我估计用不到狼牙棒，就能把这种病治好。治好了广播员，治好了歌星，就可以治其她小姐的病。如今在饭店里，听见鼻腔里哼出一句港味的“先生”，我就起鸡皮疙瘩。北京的女孩子，干嘛要用鼻腔来说话！多嗲！

这篇文章一直在谈语音语调，但语音又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内地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咱的。所谓文化，乃是历朝历代的积累。你把城墙拆了，把四合院

扒了，它还在人身上保留着。除了语音，还有别的——就拿笔者来说，不过普普通通一个北方人，稍稍有点急功近利，仗义疏财，有那么一丁点燕赵古风，台湾来的教授见了就说：你们大陆同学，气概了不得……

我在海外的报刊上看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前国军上校，和我们打了多年的内战，枪林弹雨都没把他打死。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火力还不够厉害，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老东西确实有两下子。改革开放之初，他急巴巴地从美国跑了回来，在北京的饭店里被小姐骂了一顿，一口气上不来，脑子里崩了血管，当场毙命。

就是这样可怕的故事也挡不住他们回来，他们还觉得被正宗京片子给骂死，也算是死得其所。

我认识几位华裔教授，常回大陆，再回到美利坚，说起大陆服务态度之坏，就摇头叹息道：再也不回去了。隔了半年，又见他打点行装。问起来时，他却说：骂人的京片子也是很好听的呀！他们还说：骂人的小姐虽然粗鲁，人却不坏，既诚实又正直，不会看人下菜碟，专拍有钱人马屁——这倒不是谬奖。

八十年代的北京小姐，就是洛克菲勒冒犯到她，也是照骂不误：“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在我这儿起腻，惹急了我，真他妈的拿大嘴巴子贴你！”断断不会见了港客就骨髓发酥非要嫁他不可——除非是领导上交待了任务，要把他争取过来。

粗鲁虽然不好，民族自尊心却是好的，小姐遇上起腻者，用大嘴巴子去“贴”他，也算合理——总比用脸去贴好

吧。这些事说起来也有十几年了。

如今北京多了很多合资饭店，里面的小姐不骂人了，但结果是，这几位教授却不来了。我估计是听说这里满街的鸟语，觉着回来没意思。他们不来也不要紧，但我们总该留点东西，好让别人仰慕啊！

（谭京）

故宫，你不该如此霸气

故宫，明清时期又称紫禁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因而也最蔚为壮观的皇家宫殿建筑群，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任何一位慕名而来的客人都会为故宫的博大精深和瑰丽璀璨而叹为观止。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将参观故宫列为北京之行的重头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故宫，其服务水平和服务意识特别是服务态度之低劣也同样让人“叹为观止”。

首先，售票方式落后，服务意识淡漠，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常去故宫的人都知道，午门是故宫正门，售票窗口分东西两侧，东侧售外宾票，西侧售内宾票。说是各有两、三个窗口，但实际上是经常只开一个口，不管外面排成多长的长龙，因此，要想参观故宫，首先要过买票这一关。

“五一”长假期间，这里更是人山人海，无人维护秩序。我在想，这么知名的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为什么就不能在售票方式上有所改进，采取一些适当的行之有效的方便措施呢？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售票处居然没有验钞机，所有递进去的现金要一张一张地通过肉眼去识别或者翻来覆去地用手摸，这无疑又减缓了售票的速度。有一次我斗胆问了一句，这么大的故宫，一天收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为什么就不能买台验钞机？而售票员则一脸的无奈和漠然：这事儿

我们可定不了，你有意见找我们领导反映去！

其次，检票人员态度蛮横，神武门尤其恶劣。本人因工作关系，不免经常出入故宫，曾不止一次地碰到过这种情景。午门的入口，分内外宾两个通道，而国人，特别是外地第一次来北京的人并不一定都那么明白。虽入口处有一临时戳起的“外宾入口”牌，但外地游客往往不注意就排到了外宾队伍里。工作人员不是明确地指引他们从哪个门进，而是下巴一扬“那边”，弄得这些游客莫明其妙，碰到检票员“心情不好”时还得再领受一句“傻冒儿，没长眼啊！”

见此情景，外宾常常是满脸疑惑。不知这些检票人员对自己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的如此“德行”作何感想（也许他们根本就什么也没想，抑或是习以为常而理所当然）？

神武门的检票员更是权大无比，炙手可热。和午门相反，这里的检票员多为男士，且人高马大，威风凛凛。任何一个只要迈出出口半步的人，即使伙伴走散，想回头找，那你也是妄想。我不止一次地见到和他们“理论”（实质上是求情）的游客，而他们也常常是慷慨陈词：“我知道你刚出来，但只要迈出出口，再进去就得重新买票，这是我们的规矩！”你要么再花 30 元买新票进去，要么就站在“出口”外边（你还别挡路，免得再遭训斥）翘首以待。

某日，本人带一 8 人的外宾团体游故宫，因为不够开发票的人数（据售票员讲 10 人以上才给开发票）所以门票将作为收据用，因而无法发给客人人手一张。于是，麻烦来了，一位戴墨镜的检票员命令我把票发给客人。我说，加上我一共 9 个人，你数下票点下客人不就行了，票我要报销用呢。他说：“我不管你用不用，发！”想到发给客人后，我还

得再收回，客人也难以理解，于是不甘心地说：“北京哪个景点也没这么做的，现在又没别的客人，9个人9张票，一目了然，况且，故宫正门（午门）也没要求强行发给客人的。”戴墨镜的家伙愈加不耐烦了：“你哪那么多废话，我叫你发你就得发。午门是午门，我这儿就这规矩。”

呜呼，又是规矩！暂不说这规矩是故宫博物院的规矩，还是神武门检票员的规矩，也暂不说这规矩有没有道理，它合不合法，有没有这必要，我只想问一句：就算确实有这规矩，就算这“规矩”是合理合法的，那么他们这副凶神恶煞的嘴脸也是规矩吗？为什么这种不文明之人能够霸占在这“文明的窗口”上呢？本人也曾参观过世界不少地方的著名景观，像巴黎的卢浮宫、凡尔赛宫等的知名度不亚于北京的故宫。然而，我没见过其中任何一处的工作人员这种盛气凌人的作派，我看到更多的倒是工作人员彬彬有礼，微笑作答，检票之后一声“谢谢”让人感到格外温暖。

故宫，我爱你，你汇集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精华，在外国游客面前，我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感到自豪和骄傲。然而，面对那些毫无教养甚至根本不具备起码的文明素质的服务人员，我又感到羞愧。他们不仅在给故宫抹黑，也在给首都北京丢脸，更会给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添丑。

（阿克）

俺说你们北京人

我要为“北京人”唱赞歌，因为它身上具备了外地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气质——一种真正的贵族气质。

我不想说北京人一句坏话，这并非我自视自己已经是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没有这么狭隘。北京人决不怕任何人批评，因为骂北京人最凶的正是北京人自己。

曾有人对广州、上海、深圳、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调查发现诸大城市中，自我感觉最良好的是上海人，而对自己批评最严厉的却是北京人。

只有真正的北京人才能对自己真心地说出这样的话：“别太把自己当人”——这是王朔的一句名言，它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北京人的心态。

谁能像北京人如此这般地洒脱——这就是北京人的大气，是北京人的高贵之处、可爱之处。

阿 Q 很不自信，所以特别怕人揭其伤疤。而北京人的大气却使他们对自己比起对别人而言，有更多的不满。我喜欢的就是北京人这种独特的气质，我喜欢这种自信，我为自己现在是个北京人而骄傲，我喜欢这种一览众山小的万千豪情。

北京人的大气之下好像深藏着傲慢，但这种傲慢不会伤害到外地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傲慢，它根深蒂固，枝叶繁茂，却并不被北京人自己所察觉。这似乎是出乎本能的傲

慢，其实就是一种境界。

也许正是这种境界，使得北京人自觉得有扶弱除强的义务，使得北京人对外地人、对穷人、对一切不如自己的人格外宽容、格外大度、格外友好。

到过北京的外地人一定会找到北京人欺凌外地人的种种例证。北京虽是首善之区，却决非天堂，坏人哪里都有，天堂里才没坏人。但我敢断言，一旦有人欺侮孤独无助的外地人，就一定会会有更多的北京人打抱不平。也许正是北京人无可摇撼的文化优势，使得北京人对公理、对平等、对正义等抽象原则格外感兴趣。

我到过许多城市，除了小城市好一点外，大城市对外地人或多或少总是有点歧视。我在广东问路，十个人中有九个，最好时也有七个推说不知道，更有歹毒之人向相反的方向指引。我敢断言，在北京决不会有这样的事。

一个真正的北京人总会耐心地给外地人指路，有时碰上热心过度的北京人恨不能亲自带你去，这种情况在外地绝对不会发生，绝对不会！

上海人做起生意来远不如广东人大气，他们长于盘算，却过于精细，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常落得个两手空空。

上海人似乎天生就是北京人的对立物。惟一能叫北京人真正厌烦的外地人大概只有上海人。

北京人对“好上海人”最大的赞美就是：“你不像上海人。”对“坏上海人”也仅有一句不长的批语：“你真是个上海人。”

民谣云：北京人谈主义，广东人谈生意。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这就是北京人的贵族气质。扶弱除强，爱抱不平，又使得这种气质多少沾染了点江湖气。

有这么一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在一个荒岛的监狱里，知识渊博的法利亚长老赋予了小青年邓梯斯两样东西：无与伦比的精英文化和用之不尽的财富。逃出牢笼的平民邓梯斯转眼成了基督山伯爵。实际上他不仅仅成了伯爵，按大仲马的意思——他几乎可以算作基督本人，因为他手里握有两样缺一不可的无敌武器：知识和财富。凭这两件武器就可以为所欲为纵横天下，用法利亚的话说——“你可以把狮子踩在脚下，可以拔掉龙的牙齿”。这故事是寓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兴盛所凭借的就是基督山伯爵手中的这两件武器。

这似乎是中国人的宿命：富者无知而智者缺钱。有钱人多缺文化，举止不免粗卑。他们目光俗浅，难成大气，先天的缺陷使他们不能承担民族复兴的重任。而北京人只要主义真，口袋里却难免常常拮据。

不过那又怎样？北京人有钱时，就会多出一丝凝重和慷慨，没有暴发户那种刻意作出的骄横和嚣张；没钱时又是那样的从容和洒脱，不像贫民那样的鄙琐和自惭。

真正的北京人在主流社会里。他们或是医生、记者和官员，或是专家教授、学界名流。近朱者赤，就使北京的平民百姓也透着几分独一无二的文雅之气。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聊起政局，神气得像刚刚卸任的驻外大使；国营商店的女售货员说起萨达姆和本·拉登，更似老牌军事评论家。

正如“西方”是个政治的和经济的概念，而不全是地理概念一样；正如日本亦属西方一样，北京应该算是个文化概念或文化单位，而不只是个地理概念。“真正的”北京人少而又少。真正的“北京人”全称叫“中国猿人北京种”，据说大约 50 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一个山洞里——那个丑陋的怪物，不知你们谁和他沾亲？

北京精英荟萃，北京是个大熔炉。来自各地的英才们——湖南的、四川的、江苏的……不分阶级、门第，不分种族、肤色，汇集到北京这个大熔炉中一搅和，再倒出来，就不见了湖南人、四川人和江苏人，大家都成了地地道道的如假包换的北京人。

白山黑水、五湖四海造就了这个名字叫做“北京”的文化单位，多元化和宽厚的气氛就是北京的特征！“北京人”或许就是个亚文化群，“北京人”或许就是“中国”筛选出来的优良品种。

有人断言，北京人都是杂种，这或许对，优选优育的杂种总是超过它们的父本母本。

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能在北京主流社会扎下根的外地人，无论其来自何方，最后总会在他身上多出一份在他出身地所没有的高贵——丑小鸭变成了天鹅，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北京人了，而且他会因此而骄傲——为什么不骄傲呢？也的确值得骄傲。

一个未在北京长期生活过的外地人是猜不透这个奥妙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极其狭隘可笑的地域观念，他们不明白名字叫做“北京”的这座城市与郑州、南京或其他什么城市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最愿意挖苦那些并非生在北京而自认是“北京人”的人。

更有一些丑陋的家伙，像密探和克格勃一样，总想看看北京人的户口，如果户口本上不能证实这个人生在北京，他们就可以放肆地叫他杂种，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卑劣的精神带来一丝低劣的快感，低级的心灵总须用低级的快感满足。

海之所以大，因其能容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北京啊，我为你而骄傲！

北京人似乎很崇尚权威，遵纪守法，但是任何权威在北京人眼中又无足轻重。闲时朋友聚会，饭后的余兴节目照例是笑话，笑话的主人公又多半是达官显贵领袖人物。北京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权威的不满和蔑视。

北京人幽默，幽默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正如此，北京是个盛产政治见闻、传言、小道消息和民间笑话的地方。

北京人不事雕琢，若你走在北京街头，碰到一个穿着毫不起眼似乎很普通的人，也许此人正是名门之后，要么就是名震四海著作等身的学术精英。北京真大气，真正的大气用不着刻意炫耀，真正的大气出于对自己的绝对自信，无须再借外物来表现自己的不凡。

北京人特爱看书，而且要看好书，有价值的书在北京有最好的销路。北京人特爱听音乐，而且要听真正的音乐，要听李斯特、贝多芬和拉赫玛尼诺夫。你可以说北京人玩高雅，不过我告诉你：这就是北京人的追求，北京人的生活方式。

北京人爱吃四川的辣椒、湖南的苦瓜、山东的大葱、山西的陈醋、江苏的大米、河北的小麦、俄国的大菜、美国的汉堡，北京人甚至在吃上也比外地人有更好的兼容性。

东北人只知武力，所以东北盛产“胡子”，除此之外就未见出过多少政治领袖、军事家和文人骚客。或许只有努尔哈赤是个例外。北京人遇事一定要辩出个是非曲直。东北人看北京人只动口不动手，那是误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好像就是燕人。燕赵大地专门孕育求仁而得仁、不惜杀身成仁的烈士。北京人大气盘旋如古时之士，不怒而天下安；一怒而诸侯惧”。

“五卅惨案”、“五·四运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

战”、“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北京人为正义的伸张发怒，如长虹贯日彗星奔月。北京人为“正义”一怒，常常是流血漂橹——北京人最不惜的是自己的血，最不屈的是自己不灭的忠魂！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更加富饶，但这未必就是中国的福音，资本主义还意味着罪恶。在西方人眼中，资本主义也只是一种可以容许的罪恶。资本主义在生产财富的时候，也在生产新的奴役和压迫。深圳街头灯火繁华，照不到依然黑暗的角落。长时间的劳动，菲薄的工资，蓝领工缺乏起码的权益。

深圳出口的每一双鞋、每一件衣服都染着外来打工妹的血泪和汗水。马克思的话没错，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渗着鲜血。人性本恶，人有无边的欲望，人若无约束会恶过野兽。资本主义如果没有礼义廉耻道德伦理的制衡，就会如脱缰的野马，领我们走向灭亡，所以我们仍需要文明。

北京人重义轻利的倾向，使他们成为文明的守望者。中国有伟大的文明，伟大的文明仍需人来保卫和发扬。

我爱北京人，因为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里，只有他在守卫着我们文明的核心阵地。这个古老的文明像其他一切文明一样，里面包含着正义、公理、平等，包含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包含着人间的温情和人与人的友好相处，包含着我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包含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和我们共同的希望。

（叮咚）

北京凭什么歧视外地人

跟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有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按说，流动人口在国内流动就是流动的国家公民，公民权并不因流动而丧失。可从我——一个外地来京人员的眼光看来，在北京的一些事真叫人想痛哭一场。

先说就业难。我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选择职业的权利。”第十二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不同而受歧视。”

北京的劳动职能部门历年都颁发《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行业、工种》，外来人口在京允许从事的行业被限定在尸体处理、粪便处理、建筑作业、化工行业这些苦、脏、累、有毒、危险的几个行业工种方面。1999年度北京市36个行业限用外地工的细目表中，限用工种包括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售票员、话务员、库房管理员、旅店服务员等这些多数外地人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有关部门一拨接一拨地加大对外地劳力腾岗、清退工作的力度。1999年11月29日《北京晚报》二版报道朝阳区安贞街道克服“重重阻力”把在此营生的外地人撵走，把他们经营了数年的几处便民饮食店收回，转租给几位服完重刑刚从牢狱中释放出来的北京人经营。

很多人知道，青年毛泽东曾在北京务过工。如果依照这

类限制工种的规定，可以肯定，当年“盲目流入北京”（报刊常用语）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湖南籍农民”毛泽东，将无法拥有这个就业资格。就是上了这个“岗”，迟早也会被清退。

还有消费购物歧视。在当前这个通货紧缩、鼓励消费的年代，北京依然存在着对外来人口消费的限制政策。如今不限粮油布匹了，但限制外地人在东城、西城、崇文几个城区购买商品房。

如果说购房这一消费歧视仅影响了占外来人口比例中极少的“成功人士”的话，那么用电消费的歧视则打击了大多数谋生的外地人。在北京石景山八角地区，北京供电局目前对生活用电是这样收费的：北京住户每度电0.42元，外来租房户则是每度0.82元。也就是说，外地人消费一度电，必须交两度电的钱。是电能紧缺负荷不够吗？不是。市供电局早已宣布：“北京电力告别短缺，99年度已经出现过剩。”

我曾想买一个微波炉、一个小冰箱，没准无意中能为拉动内需作点微薄贡献，但我不敢买。

在北京生活，常会碰上无收费资格的人向你伸手，收取只有外地人才必须交的费。比如邮件传达费，假如我的邮件到了，不是邮递员送来，而是住地居委会人员送来，就收“手续费”。在邮资未调高之前，取一封平信要交5毛，挂号1元，汇款单2元。

在乘坐公汽方面，北京公交公司规定：自1998年起，无北京户籍者无资格购买公共汽车月票。

在北京，外地人子女入学令大多数做父母的揪心。在石景山区，学校对外地孩子每学年收费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

还有更高的)是:除要交与城里孩子一样的约 400 余元外,还需额外多交:赞助费 480×2 (学期) = 960 元,借读费 1000 元。也就是说,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孩子的家长每年要交纳的费用也是本地孩子家长的五六倍。

要知道,外来劳力在京大多数处在谋生糊口的阶段。他们在务工、在经营小摊、在干着北京人鄙夷不屑的营生,当属城市里最困苦的一个群体。这等于是向最困难的人收取最高额的费用。这类土政策把许多学龄孩子从父母身边赶到老家,赶到乡村落后的教育环境里,赶到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孤寂的童年生活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六条“受教育者在入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我想问:人为抬高入学门槛的高收费叫不叫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平等的权利呢?第三十七条:“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而在北京,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外地)儿童,要征收高额赞助。

是教育设施的容量有限吗?不是。当今的大城市里,最普遍的现状,就是教育设施闲置,教师队伍过剩。据《参考消息》1999 年 6 月披露,由于这些年城市婴儿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所导致的生源不足,上海每年要关闭 200 所学校。

别让教学资源闲置浪费了。教育本来就是一种公有众享的非赢利资源。拆了这墩门槛,让学校教室里空着的座位满起来,行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说,孩子的家长也是北京财政的纳税人。

现今中国的跨区流动人口数量普遍预计在 8000 万到 1.2 亿之间。我们的社会居然不容易听到这个群体发出的声音，这是因为他们说话的机会太少。

北京常常申辩自己一些地方政策的必要性和京城地位的特殊性，并暗示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如此。我想说：不管对劳动力市场画地为牢的做法以及对外来人口歧视的现象在中国如何普遍，都不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法规应当存在的借口。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宪法国家，歧视都是绝不容许存在的，何况制度性、规模性歧视了。

这种温室中的保护，其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且造成了很多北京人的懒惰，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感，弱化就业竞争力和创业能力。

新千年到了，“收拾屋子迎新年”是中国的传统。北京呀，收拾东西的时候要记得，有些东西，真的该扔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不是一个大城市应有的胸襟。

自己无能，歧视别人，就是无耻、无赖、无教、无聊、无知、无能、无法、无补、无道、无德、无端、无望、无行、无益、无用、无稽之谈、无病自灸、无理取闹……

（郑年怀）